

## 蘇聯對日戰略與情報活動

楊怡芬

### 一、前言

蘇聯自帝俄以來，即以成爲「太平洋國家」爲其向東擴張侵佔的目標。十八、十九世紀時，羅曼諾夫王朝逐漸將勢力延伸到亞洲大陸的濱海地區——庫頁島——千島羣島——堪察加半島，使俄羅斯帝國能自其冰寒的歐亞凍土帶進出太平洋。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共產國家的蘇聯，仍不忘其赤化亞太地區的迷夢。列寧在他的談話中曾提到過：俄國不論在地理上、經濟上、歷史上，不但與歐洲有關連，與亞洲也有關連。列寧之後的蘇共政權以及專家學者在推行亞洲政策上及撰論有關亞洲關係的文章中，更引經據典自圓其說，指稱蘇聯不但是個亞洲、太平洋國家，同時對亞洲發生的事件享有十二分發言權及出面處理的資格<sup>①</sup>。

蘇聯東方的軍港「海參崴」(Vladivostok)，其俄語即是由「支配」與「東方」二字合義而成爲「征服東方之據點」。十月革命以後，俄境內多數都市的名字都以帶有「侵略性」、「帝國主義色彩」爲理由，改爲帶有「和平的」、「人民的」字眼的名字，唯有「海參崴」仍然沿用舊名。蘇聯領土橫跨歐亞兩洲，是個十足的陸權大國，但是它却缺乏具有戰略價值的濱海港口，因此它在亞洲濱海地區的幾個港口都市即成了向東擴張海權的軍事據點<sup>②</sup>。

蘇聯的全球戰略，在權衡長程利益時，迄今仍然是以歐洲爲其主要目標，亞洲地區只是居於次要的地位。傳統上，當蘇聯在歐洲面臨安全問題時，它會在亞洲設法維持平穩的局面。不過，隨著與中共的衝突及美國在亞洲政策的轉變，蘇聯對東亞地區的

註① 柯瓦年科 (I. I. Kovalenko) 曾在「蘇聯與亞洲的集體安全體系」(莫斯科：「科學」出版社，一九七六)一文中提到：「蘇聯的領土有三分之一在亞洲大陸上，因此亞洲發生的任何事件對蘇聯具有特殊的意義。」

註② 松井茂「『危うい國ニッポン』ソ連はこれだけ日本を分析している」(「正論」，一九八四年，三月號，六二—七四頁)。

戰略權衡亦隨之昇高。

蘇聯亞洲政策的目標顯然是：抵制中共勢力的擴張，逐漸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地位，最後建立蘇聯在亞洲的超級強國的地位。爲了達到這些目標，蘇共曾經倡議建立「亞洲安全體系」，企圖謀求區域性的「安全之改善」。蘇聯在歐洲的積極努力策劃活動，終於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召開了「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確保歐洲正面的安全；而且在「歐洲安全保障」的大前提下，締結了如蘇德條約、西德·波蘭條約、東西兩德條約、柏林四國協定等雙邊或多邊條約。蘇聯希望在亞洲也能建立類似的「安全體系」，使蘇聯能和一些有力的亞洲國家締結友好合作條約或是善鄰合作條約，造成有利於自己的形勢<sup>③</sup>。但是，亞洲較歐洲情況複雜，加上中共蘇聯爭執未已，蘇聯的「亞安體系」並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五〇年代，由於美國大力協助南韓並駐軍日本，阻遏了蘇聯在亞洲的發展，因此，蘇聯當時亞洲政策的目標在於削減美國在中國、韓國、日本的力量。六〇年代，「中」蘇衝突日增，給予蘇聯的亞洲政策極大的打擊。同時日本的經濟力逐漸穩固強大，蘇聯亞洲政策的目標即在防止美國利用日本的經濟力量對付蘇聯，防止中共的意識形態蔓延到亞洲其他區域。七〇年代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日本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使得蘇聯不得不澈底改變其亞洲政策。此時期蘇聯的政策目標即是防止美國與日本，美國與中共，或日本與中共結成反蘇小聯盟。

## 二、日本列島在蘇聯亞洲政策中的戰略地位

蘇俄與日本兩國之間互相存在著先天的疑懼與敵意。早在帝俄時代，雙方即發生衝突。造成日俄衝突的背景，是俄國勢力的東進與日本勢力的北進，而使得這兩枝向外擴張侵略的箭頭，交會在東北亞地區。雙方爭奪的焦點，一爲黑龍江口的庫頁島，二爲中國的東北以及朝鮮半島。日俄雙方對於庫頁島之主權所屬幾經爭執，最後於「聖彼得堡條約」（一八七五年）中，決定由俄國以千島羣島向日本換取該島之全部主權。兩國對於庫頁島主權的爭執才暫告一段落。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當時滿清政府被迫於「馬關條約」中將遼東半島割予日本，可是俄國惟恐日本勢力伸入中國東北，於是聯同德、法兩國出面干涉，迫使日本退還遼東半島於滿清政府，此項干涉使日俄關係趨向惡化。之後，俄國又趁機逼迫滿清政府，強行租借大連、旅順爲軍港，使其勢力伸入中國東北的中、南部，大連、旅順成爲俄國征霸亞洲的根據地，也種下了日俄戰爭（一九〇四～五）的起端。日俄一戰俄軍敗北，使得俄國之東進政策稍受到挫折，但是戰敗的屈辱却使蘇聯人至今仍未忘懷。

註③ 木村明生（ソビエト外交論），泰流社 二二二～二三五頁。

接著十月革命帝俄被推翻，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不久，日本即與歐美列強聯軍出兵西伯利亞，企圖佔領蘇聯在亞洲境內的領土，雖然沒有成功，但却使得蘇聯遭受重大的人、物雙方面的損失。一九三〇年代，日軍又出兵東北地區，與蘇軍在邊境地帶發生武裝衝突事件，使蘇聯對日本這個國家抱有強烈的不信任感。

另一方面，對日本而言，蘇聯在二次大戰末期片面廢棄中立條約對日宣戰，在東北對日人的殘酷暴行及將日人強制監禁於西伯利亞。這些往事，在日本人記憶裏歷歷如新。戰後蘇聯近乎蠻橫地佔領日本北方四島，不作絲毫讓步，以及對日本沿海地區進行海空挑釁，更引起日人的強烈仇俄情緒。

蘇聯對日本早存覬覦之心，因為在其東進政策中日本列島有著重要的戰略位置。早在二次大戰結束的翌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史達林就曾提出佔領北海道的留萌——釧路以東的要求。而且在一九五一年盟國對日締結舊金山和平條約時，史達林也曾提出十數項的修正要求，其中有關日本海的項目，更可明顯地透露出蘇聯對日本列島的企圖<sup>④</sup>。其內容為：「將宗谷海峽、根室海峽、津輕海峽及對馬海峽等日本四島沿岸地區非武裝化。上述諸海峽必須對所有國家的商船開放通行」。「上述諸海峽只能對濱臨日本海的國家之軍艦開放通行。」蘇聯是個濱臨日本海的國家，蘇聯的軍艦，在此項規定之下，自然能夠自由地由日本海進出太平洋，但是相反地美國的軍艦就不能進入日本海。由此可以看出蘇聯意欲確保日本海的制海權而使其內海化之企圖。另外，史達林又要求加入下列條文：規定「日本不得加入任何曾經對日作戰的國家所組織的聯盟或軍事同盟」。很明顯地，蘇聯欲藉此防阻日本加入任何集體安全保障體系而使日本中立化。假若日本海能夠成為蘇聯的內海及日本中立化的話，蘇聯就能像當初對付東歐附庸國家一般，而使日本成為蘇聯的衛星國。這對蘇聯而言，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的利益：

(一)軍事方面的利益。蘇聯將可利用日本各地的機場、航空站及港灣設施，提高其在西太平洋上的制空、制海權的能力，同時日本海一旦成為蘇聯的內海，能夠取代自然環境較差的鄂霍次克海而變成蘇聯核能潛艇的聖城，不但使蘇聯的對美防禦線前進一千公里以上，而且蘇聯的太平洋艦隊最感頭痛的「海峽封鎖」問題，亦可迎刃而解了。

(二)經濟方面之利益。日本比起東歐附庸國家，有著優異的工業技術的基礎與潛力及勞動力，可供蘇聯充分運用於軍事、民生兩方面。尤其是對於開發西伯利亞所需的技術、設備及人力均有著落，對解決蘇聯經濟的困境有直接、間接的效益。

(三)對亞洲地區的政治性影響。日本一旦被「共產化」，朝鮮半島首當其衝，韓國腹背受敵；而中共亦會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深受威脅。因為中共目前的處境是：西方有阿富汗、印度等親蘇勢力，而南面又有越、寮、柬三國與中共的對立，如果東面再加上日本，對中共是最不利的局面。至於對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影響之大，更不待言。

註④ 菊池謙治「ソ連から見た『日本海』」、〔知識〕，一九八四年，夏季特刊號，三二六～三三三頁。

最後，對美國而言，如果西太平洋的制空、制海權被蘇聯奪去的話，美國只能退守東太平洋。在這種情況下，受其影響的除了亞太地區的自由國家之外，還可能及於西歐諸國、中近東地區，甚至非洲的國家。

雖然蘇聯的條件未被接受，日蘇和約迄今尚未簽訂。可是日本列島在蘇聯東進政策中所佔的戰略性地理位置，以及優越的近代化科技和經濟能力，則一直是蘇聯垂涎的主要對象。

### 三、蘇聯對日戰略的目標

由於歷史因素所造成的強烈的不信任感以及近年來「軍事威脅」所產生的恐懼感，蘇、日雙方自一九五六年簽署「蘇日共同聲明」恢復外交關係以來，一直無法進一步締結和平合作條約。

但是，儘管蘇、日兩國在政治關係上躊躇不前，在經濟關係上却時有進展。地緣的接近與商品結構的相當，使得政治、經濟體制完全相異的兩個國家却在貿易上形成相輔相成的關係。可是這種關係仍舊缺乏平坦誠實為基礎。蘇聯政府鑒於日本經濟實力的成長，對於日本的疑心與猜忌也愈來愈大。這種態度使得蘇聯對日政策陷入了矛盾之困境。蘇聯一方面認為日本經濟實力茁壯之後，就會脫離美國之保護，屆時蘇聯若「誘」以經濟合作而使蘇聯的資源與日本的技術彼此互惠，將會有助於蘇、日關係的改善；但是蘇聯又擔心一旦日本重整軍備，將在東亞局勢上給蘇聯帶來壓迫感。於是蘇聯一方面藉談判讓步的政策，對日本展開經濟誘惑，以及折衷解決北方漁業問題，在日本國內形成政界與民間、北方與本州居民之間在利益觀點上之矛盾與衝突；另一方面則在遠東地區及北方四島加強軍備部署，俾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嚇阻日本的輕舉妄動。

克里姆林宮的對日戰略目標，可以大致分成四項<sup>⑤</sup>：

- (一) 阻止日本與美國、中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之間的關係更加親密化。
  - (二) 防止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傾向的復活或增強。
  - (三) 吸取日本的資金並導入科學、技術、設備來開發西伯利亞、遠東地區，以助解決國內的經濟困境。
  - (四) 堅持「北方領土」問題是「已經解決」「不復存在」之問題，不使其成為蘇、日關係之障礙。
- 實際上，右列四項對日戰略目標是互相矛盾的。因為蘇聯若是想要達到上述第(一)~(三)項目標，則勢必要放棄堅持第四項目標，但是「領土問題」却正是阻撓蘇、日兩國發展正規政治關係的關鍵原因之一；而西伯利亞的投資條件也不甚理想，日方已經逐

註⑤ 木村汎「クレムリンの對日戰略」，收集在「クレムリンの論理」第一章中，國際關係研究會編，一九八二年出版。



漸減低其對開發西伯利亞的興趣，何況若爲此而招怨於中共，或使蘇聯增加其在遠東地區的影響力，則更非日本所願。事實上，蘇聯也了解，後二項不可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因爲蘇俄對於北方領土，基於國防上的需要及其對東歐附庸國領土問題的顧慮，是絕對不願歸還於日本的。至於經濟合作問題，蘇聯知道祇要誘之以「利」，即使得不到日本政府的協力，仍可以從親蘇人士和民間團體方面得到它所需要的東西。因此，蘇聯對日本政策的重點還是在於削弱美國在日本的勢力和防止日本與中共形成反蘇聯盟；並且利用一切手段，分化日本與其盟國的關係，改善日本人民對蘇聯的觀感。

一九六九年，尼克森總統發表「關島聲明」，決定逐漸削減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兵力，轉而要求盟國加強自衛能力。亞洲國家面對美國政策的此一轉變，紛紛力求自保，唯有日本在「美日安保條約」之下，繼續受到美國軍事的保護。一九七五年底福特總統發表「新太平洋聲明」，強調日本在美國亞洲戰略上的「夥伴」(Partnership)關係，並將日本置於「對等」的地位，但亦要求日本應負擔相等的防衛義務。

不過，美日兩國雖在軍事上有著同盟的實質關係，近年來雙方在經濟貿易關係上的衝突却愈來愈嚴重。日本國民尤其是農民階層在自民黨、農會內的保守派和左派勢力的煽動下反美情緒高昂。同時由於蘇聯加強遠東地區的軍備，不斷在日本四周進行軍事性的示威行動，使日本國民對蘇聯產生恐懼。同樣地，美國也採取相應的對抗政策，升高日本周圍的「緊張」氣氛，又使日本民衆產生「消極」態度，以爲只有退出與美國的「同盟」，保持中立，才能得以「自保」。實際上，這正是蘇聯利用日本國民的恐懼心理與消極意識所進行的宣傳謀略<sup>⑥</sup>。

此外，蘇聯亦積極地策劃在日本境內掀起反核、反美運動。一九八一年秋，蘇聯共產黨中央國際部副部長柯瓦年科到日本，對社會黨、共產黨、勞動團體、廣播媒體和宗教界大事宣傳，得到七千五百萬人的反核簽名，揭開日本反核和平運動的序幕<sup>⑦</sup>。一九八四年一月下旬，柯瓦年科會同國際部日本課課長庫茲涅佐夫再度來日，與日本財政界和廣播、報社人士頻頻接觸，並且和日共國際部部長立木長談<sup>⑧</sup>，協商如何採取共同步調來進行反核反美運動。五月底，美軍艦「新澤西號」裝載著「戰斧型」(Tomahawk)巡航核子飛彈駛進日本港口，反核派民衆在橫須賀聚衆示威遊行；在野黨亦在國會質詢，要求日本政府遵守「非核三原則」，禁止裝載核子武器的美國軍艦通過日本領海及在日本境內靠港修護或補給。

事實上，這是一種「矯枉過正」的說法。「非核三原則」指的是「不製造核武器，不持有核武器，及不搬入核武器」。前一

註⑥ 會野明「一九八四年の米ソ關係とソ連の對日戰略」，〔世界思想〕，一九八四年，二月號，二二一—二四頁。

註⑦ 會野明「ソ連情報戦争はカネがかかる」，〔時の課題〕，一九八四年，七月號，二二頁。

註⑧ 橋永二郎「仕組まれた『ソ連製』反米運動」，〔世界思想〕，一九八四年，八月號，二二〇頁。

項比較容易遵守，第三項「不搬入核武器」的原意，是指「不在日本國內成立核武器基地」，短時間的靠港停泊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一點却成爲反核派用來牽制、壓迫政府的理由。而且由於美日雙方對此問題詮釋的角度與立場不同，雙方誤解頻生，造成美日關係趨向「冷卻化」，甚而帶給美國大選不少的影響。

蘇聯一方面策劃「離間」美國與日本，一方面則不忘對日本進行「軟硬兼施」的「威脅」與「利誘」的手段，日本的財政界和漁民都是這種手段的運用對象。蘇日兩國除了領土問題未獲解決之外，每年尚爲了漁產品收穫量進行交涉。對四週環海的島國日本而言，漁產品是日本民衆不可或缺的食品。日本總漁獲量的百分之四十約四〇〇萬噸是從外國海域中獲得；而其中又以蘇聯領海域內約一七〇萬噸最爲重要。蘇聯與日本曾於一九五六年訂定蘇日漁業條約，又於一九七七年另訂蘇日漁業協定，規定二百海里作業範圍。此後每年更換新約，訂定該年次的漁獲數量<sup>⑨</sup>。但是該數量不僅年年遞減，而且蘇方附帶的條件愈來愈嚴苛，使日本北方漁民苦不堪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簽訂的蘇日漁業條約中，蘇聯以其漁船船員休養與補給必要物資爲理由，向日方要求使用位於本州北部福島縣內的小名濱港<sup>⑩</sup>。這是蘇聯首次自日本取得漁業作業基地。蘇聯對此要求爲時已久，一直無法得逞，是年年底日本正值大選，政局稍呈混亂，給予蘇聯可趁之機。日本部份反蘇人士擔憂，蘇聯的KGB（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可能利用漁民的身份靠岸上陸，在日本國內興風作浪。小名濱港位於福島縣，與臨近的磐城市、平市等十四個大小市鎮成爲一個多面規模的新興工業城市，經由高速公路只要二小時即可到達首都東京。更重要的是在小名濱港的鄰近地區，尚有日本宇宙航空中心和日本科技重心的筑波學園城等，是日本爲發展最新銳科技而投下巨資興建的產業都市。蘇聯要求在此港上岸作業，不難窺視其企圖所在；何況此例一開，蘇聯難免會接二連三地要求使用其他港口。因此，日本政府應該重視此一問題的發展及預防可能帶來的後遺症<sup>⑪</sup>。

#### 四、蘇聯對日戰略的指揮系統

本節來討論蘇聯對日戰略的指揮系統<sup>⑫</sup>。（請參閱圖1）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國際部（以下簡稱蘇共國際部）是蘇聯施行對外戰略政策的總司令部。蘇共國際部是承繼一九四三年

註⑨ 高山智〔日蘇關係〕，教育社，一九七八年出版，九九～一〇頁。

註⑩ 齊藤忠「本州太平洋岸のソ連工作基地」，〔世界思想〕，一九八四年，四月號，六〇～六九頁。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同註②。

解散的共產國際的任務，負責對資本主義各國的左翼運動和共產黨的指導，對社會主義各國則另由社會主義國家部負責。蘇共國際部之下負責執行實際任務的是KGB（國家安全委員會）和GRU（蘇聯軍參謀本部情報局）。蘇共國際部的現任部長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兼書記的波諾馬廖夫（B. N. Ponomarev），第一副部長是蘇共黨中央委員的札古拉金（V. V. Zagladin），副部長是威里雅諾夫斯基（R. A. Uliyanovsky）（負責遠東地區）。

蘇共國際部中設有日本課，是負責對日戰略的大本營，並且派遣駐日代表，主要的任務即是實地對日本各個政黨進行政治宣傳和諜報工作。日本課的歷任課長都是熟悉日本一切事務的專家，現任課長是曾經以國際部駐日代表身份擔任蘇聯駐日本大使館參事的庫茲涅佐夫（V. V. Kuznetsov），而現任國際部駐日代表則是曾任蘇聯駐日本大使館二等書記的費札依諾夫（Fesunov）。日本課的前任課長柯瓦年科（I. I. Kovalenko）於一九八〇年昇任為國際部副部長。因此，無論是波諾馬廖夫，或是札古拉金、柯瓦年科、庫茲涅佐夫和費札依諾夫，正好都是蘇聯共產黨本部對日戰略的關鍵性人物，與庫茲涅佐夫與費札依諾夫據說是出自柯瓦年科直系的人，由此更可看出柯瓦年科正是蘇聯對日戰略的總司令官。柯瓦年科今年六十五歲，已屆退休年齡，但是他的後任者皆是他的嫡系人物，他即使退休，蘇聯對日戰略的整個體系和目標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KGB是實際負責執行情報謀略的機構，其第一總局則負責對外工作，總局之下設有第七局（負責日本、印度、東南亞地區）、A局（負責偽情報工作）、S局（負責非法潛入工作）、T局（負責蒐集科學、技術情報工作）、情報第二部（負責反情報、保全工作）等單位。第七局派遣KGB幹員分駐各國，通常是隱身在蘇聯駐各國大使館內，或是偽裝成新聞雜誌社特派員、貿易商人等身份。依據列夫欽科的證言<sup>⑭</sup>，目前KGB東京支站的工作人員約有五、六十名，劃分為幾個小單位，其任務除了政治宣傳、反情報、蒐集情報外，還包括探查日本政府對美國及對中共的政策以及協助越戰中的美軍逃兵由日本偷渡到蘇聯。現任第一總局第七局副局長是普倫尼柯夫（V. Pronnikov），曾任KGB東京支站站長。根據列夫欽科證言，他曾經因爭取到日本自民黨國會議員石田博英為KGB工作有功而受到蘇共黨中央委員會的重視，獲得高昇，但是亦有傳聞顯示，因為列夫欽科作證時曾經表示是與普倫尼柯夫發生衝突才興起逃亡投誠之念頭，因此，普倫尼柯夫據說已喪失其原有之政治地位<sup>⑮</sup>。

除了KGB的指揮系統外，尚有GRU（軍方情報總局）的指揮系統。GRU主要的工作是蒐集有關戰略、戰術性的軍事情報，為軍事情報的首腦機構。其任務完全是對外的，其中有一遠東局，派遣幹員到各個駐外大使館內，負責大使館的安全防衛和秘密策反、潛入等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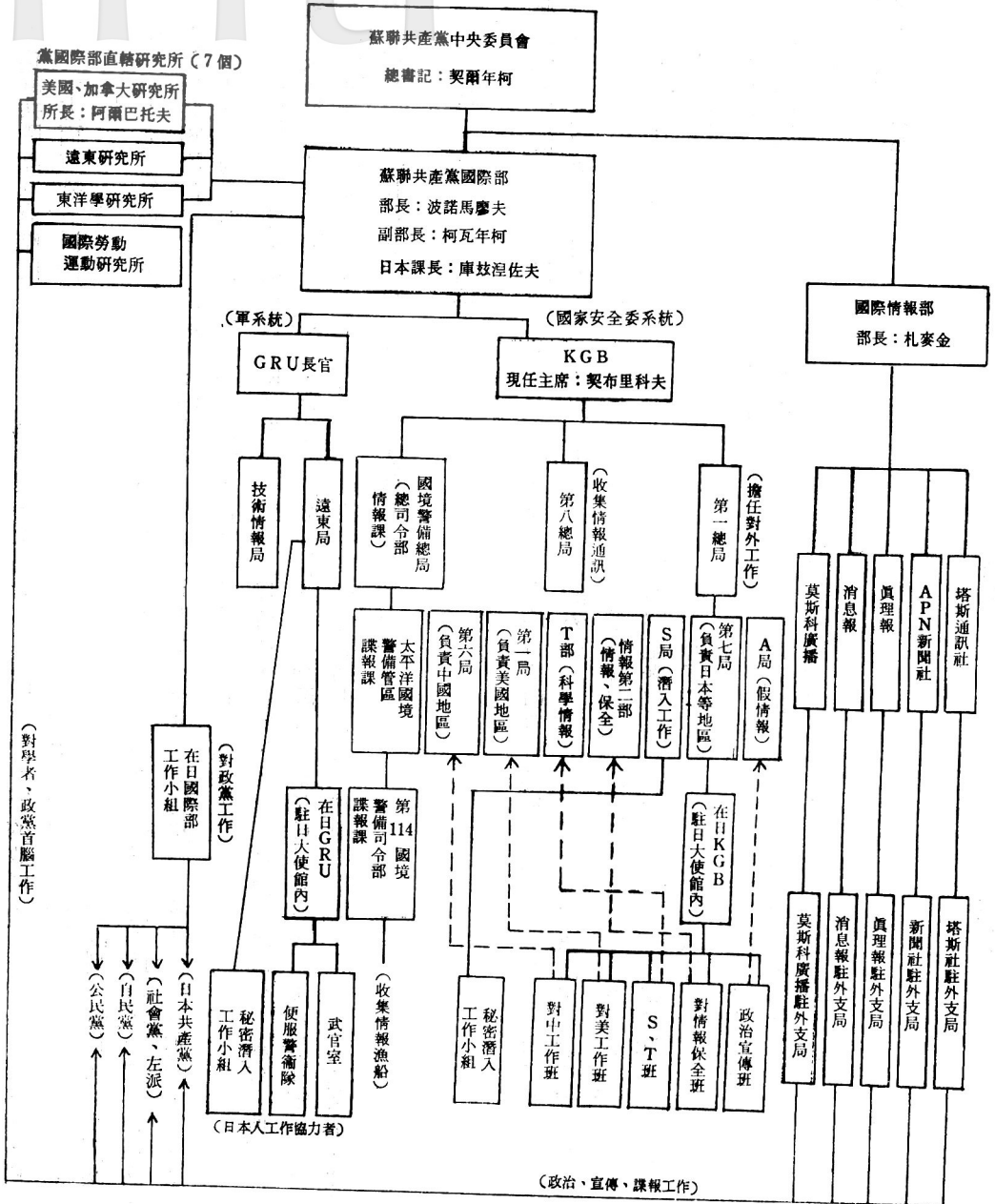
註⑬ 澤英武「KGBの對日ハンドブック」，「知識」，一九八三年，春季號，八〇～八八頁。

註⑭ 同註⑬。

(圖1)

蘇聯的對日工作指揮系統

蘇聯對日戰略與情報活動



資料來源: 松井茂[危うい國日本], [正論], 1984, 3月號

此外，在蘇共國際部直轄的七個研究所裏，有一批學者專家專門研究各國的政情、經濟、外交動態，各研究所的負責人經常到國外訪問，一方面拉攏各國的黨政要人或學者，一方面作政治宣傳或蒐集情報。如美國、加拿大研究所所長阿爾巴托夫（G. A. Arbatov）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訪問日本，即是要探聽日本國內之親蘇派系是否會因列夫欽科證言受到某種程度之打擊。日本課課長庫茲涅佐夫也曾任遠東研究所出版的「遠東問題」雜誌上發表論文：「日本的內政情況」<sup>⑮</sup>，詳細描述日本政界存在的派閥紛爭，對蘇共國際部日本課對於「田中賄案」帶給日本政界的影響，至為關心，並且認為日本的保守派系若是因此而分裂甚或沒落的話，則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將不攻自滅，自能打開日本革命之道<sup>⑯</sup>。

另在蘇聯共黨政治局下尚有中央國際新聞部，主要是以廣播、新聞等媒介，透過各地的分站進行宣傳工作。現任部長是札麥金（L. M. Zamyatin）。而這些新聞、雜誌社的駐外特派員、評論員正是KGB或GRU幹員最好的掩護身份。根據列夫欽科的證言，以東京一地為例，蘇聯廣播、報紙等各社的特派員合計為十八人，其中「塔斯社」和「諾波斯基新聞社」各佔六人，而六人之中，約有一半是KGB幹員，及一、二人的GRU幹員<sup>⑰</sup>。

## 五、結語

蘇聯是個真正的「武力理論者」，經常巧妙地運用武力的關係與背景獲取政治性的成果。一九八四年二月繼安德洛波夫接任蘇聯最高指揮權位的契爾年柯，在其就任演說中即以強硬的姿態，表示出第一要繼承安德洛波夫的路線，第二雖不求取軍事優勢，但也不容許武力均衡遭到破壞。的確，蘇聯「赤化全球」的終極目標是不會因領導人物的更迭而有所改變的。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蘇聯駐日大使館的二名武官召開記者招待會，說明「日本若能保證遵守『非核三原則』，則蘇聯有意與日本締結不使用核武器的協定」。同時他們還表示，「美海軍第七艦隊若是配備『戰斧型』巡航核子彈，無疑地將會破壞遠東地區的軍事均衡，蘇聯將會採取必要的對抗措施。」可以看出蘇聯對日本國民與輿論界威脅恫嚇、軟硬兼施的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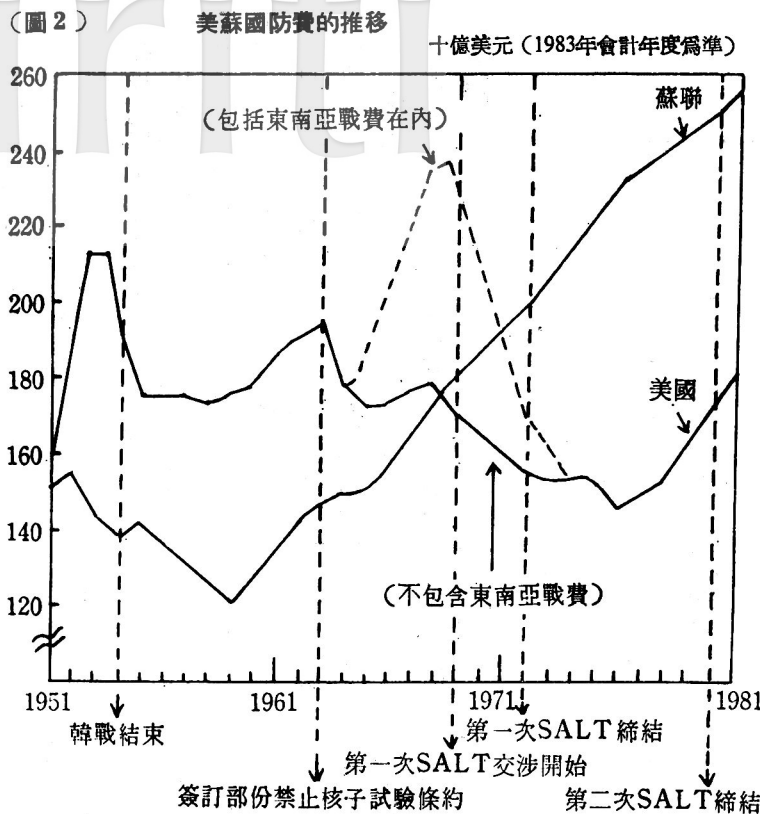
蘇聯認為美國在遠東地區部署『戰斧型』飛彈會破壞遠東地區的均勢，但是事實上，蘇聯却大力在此地區擴張軍備。蘇聯的國防費用，現在每年大約在二、五〇〇億美元，相當於二十年前的二倍<sup>⑱</sup>。而美國則維持在一、八〇〇億美元左右，除了越戰期

註⑮ 同註②，六八頁。

註⑯ 同註②，六八頁。

註⑰ 同註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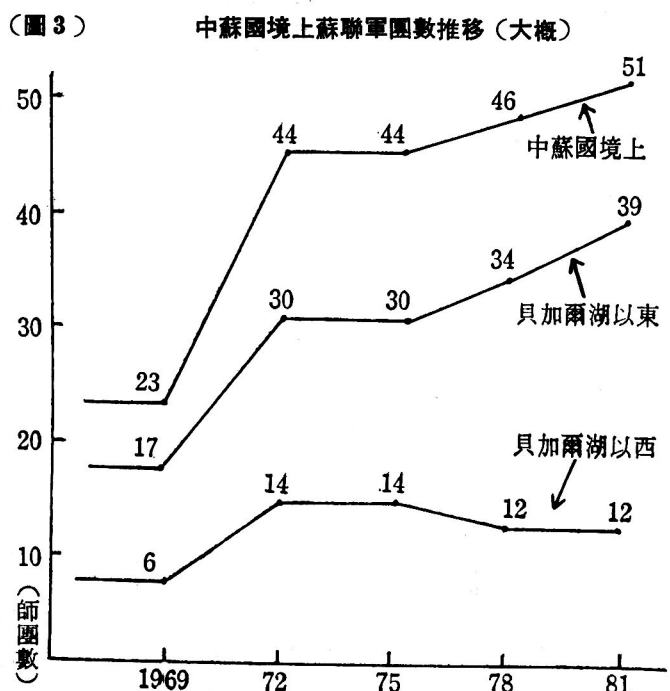
註⑱ 久松公郎「日韓米の防衛體制で極東ノ連軍に對處せよ」，『世界思想』，一九八四年，八月號，七六頁。



資料來源：「美國國防報告」(1983年度)

間曾經大幅度提高以外，過去二十年來沒有多大的改變(圖2)。爲了要達到世界共產化的目標，不管國內民生物資的缺乏，經濟生產率的低迷不振，花費大量的經費用以擴張軍備，使得蘇聯在新式武器尤其是戰略核武器的研究發展面上幾乎凌駕美國之上。目前蘇聯在東部地區部署了五十二個陸軍師團，約佔蘇聯陸軍總兵力的四分之一，其中的二十四個師團部署在遠東軍區，另外在日本北方四島上亦有一個師團(圖3)。

蘇聯遠東空軍機數約計二千餘架，數目上較前雖無多大的變化，但是新加入的航程長的第三代新型戰鬥機(例如米格二十三，SU二十四等)，增強了蘇軍對外攻擊時空中戰鬥的實力。



資料來源：久松公郎「日韓米の防衛體制で極東ノ連軍に對處せよ」  
 「世界思想」，1984年8月號



蘇聯遠東海軍軍力擴展的程度最爲顯著。蘇聯四大海軍艦隊中最強大的太平洋艦隊，過去十多年以來從六〇萬噸增加到一六〇萬噸（約八〇〇艘艦艇），其中約有一三〇艘的潛水艇，半數以上爲原子動力，另三一艘載著戰略核武器。此外，除了原有的「明斯克號」航空母艦之外，最近又加入了基輔型「新俄羅斯號」航空母艦。觀察家以爲蘇聯在遠東地區增加航空母艦，主要是在對抗美國太平洋艦隊軍力的加強<sup>⑧</sup>。

在飛彈方面，除了原有的洲際彈道飛彈（ICBM）及潛射彈道飛彈（SLBM）外，一九八三年還增加了中距離核子飛彈SS二〇。蘇聯在遠東地區部署SS二〇，的確在日本造成不小的震撼。加上蘇聯不斷地在日本四周製造緊張氣氛，並且透過日本的左派及反核運動份子呼籲締結和平條約以確保日本的利益，使得部份日本民衆產生消極思想，中了蘇聯「心理戰」的謀略。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日本憲法的限制及美日安保條約之下，僅能擁有一定限度的自衛能力，主要是由美軍留駐日本，協助防衛日本安全。但是隨著美國對太平洋政策的改變，美國要求日本增加自衛與防衛太平洋地區的軍備力量。當然，眼見蘇聯顯著地擴張其在遠東地區的軍力，任何一個亞洲太平洋國家是不能置身事外的。尤其是日本，戰後一躍成爲經濟強國，在自由陣營的地位愈益重要，更應該無懼於蘇聯的威脅利誘，而與自由國家加強合作，共同維護亞洲的安定與和平，才是日人之幸，亞洲人民之福。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完稿）

註⑧ 「讀實新聞」，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 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

汪學文 著

中共對於「文字改革」，謀略多端，內容複雜，其主要目的在廢棄漢字、篡改歷史，進而破除中華傳統文化。本書詳述中國文字之結構與演進，並對中共「文字改革」工作，從理論與實際，分別加以論析。全書約廿餘萬字，二十五開本，計三百頁，每冊實售新臺幣二百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歡迎惠購。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